

從一九三〇年代之貧困描寫閱讀 複數的現代性

星名宏修

琉球大學法文學部副教授

莫素微 譯

中華技術學院專任講師

中文摘要

一九三五年一月發行的《第一線》(台灣文藝協會機關誌)所刊登的徐瓊二的〈島都的近代風景〉與王錦江的〈夜雨〉兩篇短篇小說,都捕捉了台北正在蛻變的樣貌。兩位作者所描寫的「島都」的「近代性」,特別突顯了大稻埕的光與影。

琅石生的〈闇〉(《台灣文藝》,1935年2月)與黃氏寶桃的〈人生〉(《台灣新文學》,1935年12月)與上述兩篇作品約莫同時期發表。本論文將以後者二作為中心,對大稻埕內部的黑暗面以及「島都」以外「地方區域」的經濟與社會逐漸解體的現象進行解讀。同時,也將檢視殖民地支配者對於這樣的貧困狀況如何監控、凝視。

關鍵詞：琅石生、王錦江、《第一線》、複數的現代性

The Multiple Modernity within the 1930s' Writings on Poverty

Author: Hoshina Hironobu

Associate Professor, Faculty of Law and Letters, University of the Ryukyus

Translator: Mo Su-Wei

Lecturer, Chin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bstract

Published at *Diyixian* (The magazine of the Association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in January 1935, both Hsu Chiung-Erh's *The Modern Scene in the Metropolis of Island* and Wang Chin-Chiang's *Rain in the Night* capture the silhouette of Taipei under the development at this time. The metropolitan modernity of Taiwanese island portrayed by two writers indicates the light and the shadow of Tataocheng.

Centering on Lang-Shih-Sheng's *Darkness (Taiwan Bungei)*, February 1935) and Huang-shih Pao-Tao's *Life (Taiwan ShinBungaku)*, December 1935) which were published simultaneously as the works in above, this paper will shed light on the darkness of the internal Tataocheng and the under-going economical and the social corruption in the metropolis of Taiwanese island and the other locals.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will also examine how the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kept watch over the situation of poverty.

KEY WORDS : Lang-Shi-Sheng, Wang Jin-Jiang, *Diyixian*, multiple modernity

從一九三〇年代之貧困描寫閱讀 複數的現代性

一、引言——《跳舞時代》描寫的／未描寫的

獲二〇〇三年金馬獎影展最佳紀錄片之《跳舞時代》提供了思考台灣「殖民地現代性」之絕佳材料¹。電影一開始即出現跳舞和划船的年輕男女鏡頭以及以下的旁白：

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人統治了台灣五十年。不曾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你我，總以為那段殖民時期的歷史，只有悲情。但是，在一九三三年台北街頭，年輕男女傳唱著一首流行歌，〈跳舞時代〉。好像唱出了另外一種時代的風情。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年代。一個在長輩心中，默默回味的年代。卻是年輕人記憶中，完全空白的年代。

這部電影的主題明確，從日本人統治的五十年「殖民時期的歷史」中，去拾掇不只是「悲情」的「另外一種時代的風情」。電影以一九三三年流行的台語流行歌曲「跳舞時代」為主軸，貫串幾個相關人士的證言，於台北「島都」開花的摩登文化愈益鮮明起來。

的確，在日本統治的五十年間並非只是「悲情」。在一九三〇年代已具備如跳舞或划船等年輕人他們可以盡情享受的快意摩登生活。在以年輕的台灣人上流階級為主角的林輝焜〈命運難違〉中，日常生活中充塞著咖啡廳、啤酒屋或

¹ 簡偉斯、郭珍弟導演，《跳舞時代》（公共電視文化基金會，2003年）。

百貨店等新風俗²。以下要引用的一九三四年《台灣日日新報》的報導也充分展現出台北／大稻埕的「摩登都市化」風貌。

近年來，路燈照明及道路舖裝完成後，同時，大百貨店、大店舖也接著一家一家開幕。在已經近代化、都市化的台北大稻埕都心區太平町大道開張のエルテル、第一家、世界、孔雀等咖啡廳，更增添繁華氣氛。以及附近太平町3丁目的Salon OK大Café幾近完工，太平町5丁目現在也有大Café在動工……。這一切興建完成之時，與永樂市場的完建後，則過去被稱為塵埃巷道的大稻埕，名副其實地獲得在商業上、娛樂上都市摩登化的契機就真的指日可待了。³

然而，儘管台北／大稻埕是將要「摩登都市化」，但並非所有的台灣人都能享受到繁華而舒適的生活。如Harry Harootunian所指出，「日常性的論述雖由都市的觀點或中產階級的慾望所構成，但對都市生活的亮麗、炫目、效率性及街頭文化的歡樂、興奮加入熱度的描寫時，卻常是隱蔽著不平等的現實。⁴」

《跳舞時代》成功地擷取了三〇年代的「都會生活的亮麗」以及「另外一種時代的風情」。但是，有哪些人可以品嚐到那「風情」的滋味？又是誰被排除在外呢？這部電影卻是連提都沒提到所謂的「不平等的現實」這一點。

誠如上述新聞記事報導，一九三〇年代的台北是處在「都市摩登化」的激烈變化之中。有許多文學家也在其作品中記下這個「島都」當時的面貌。例如徐瓊二的〈島都の近代風景（島都の近代風景）〉，以及王詩琅的〈夜雨〉（兩篇都刊登於1935年1月《第一線》），它們與台北的「另外一種時代的風情」，讓吾人同時看到了台灣人的失業、貧困等「不平等的現實」⁵。

² 林輝焜，〈命運難違〉，自1932年7月至1933年1月連載於《台灣新民報》，後於1933年4月自費出版。現收錄於河原功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集成3》（東京：綠蔭書房，2002年）。

³ 〈大稻埕明顯現代化 奢華的咖啡街天天開放的劇場即將誕生了〉，《台灣日日新報》（1934年3月6日，晚報），頁2。

⁴ Harry Harootunian，〈以近代來超克——關於兩次大戰期間被傳奇化的日常生活與社會體的言論〉，《思想》（東京：岩波書店，1997年12月），頁124-132。

⁵ 星名宏修，〈複數的島都／複數的現代性——以徐瓊二〈島都の近代風景〉為中心〉，新竹：清華大學主辦，「台灣文學與跨文化流動 第五屆東亞學者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報告論文，2006年。

本文想要證明兩件事。首先是與徐瓊二等人的作品同年，亦即被稱頌為是「成長中台灣的光輝博覽會」⁶之「施政四十周年台灣博覽會」盛大舉行的——一九三五年這一年所發表的琅石生之〈闇〉（《台灣文藝》，1935年2月），與黃氏寶桃的〈人生〉（《台灣新文學》，1935年12月）這兩個作品，以之為中心，來檢視台灣人作家如何表現深刻的貧困問題。此外，還要解讀殖民者日本人到底用什麼視線凝視貧困的台灣人。

至於結論部分，則是要總結這兩個完全迥異的對下層台灣人之觀點。換言之，本篇論文將以一九三〇年代的貧困表現為焦點，考察台灣人與日本人各自抱持什麼樣的觀點論述「不平等的現實」這個問題。

二、「島都」台北之光與〈闇〉——琅石生〈闇〉（《台灣文藝》，1935年2月）

如在〈複數的島都／複數的現代性〉當中所敘述的，台灣人居住的區域以大稻埕的「太平町」（現在的延平北路）為中心涵括附近繁華街道，及其緊鄰的貧民窟。在琅石生的小說〈闇〉當中，不只有對大稻埕內部複數性的描寫，還包括與台北島都落差極大的「南部鄉下」之描述。

但關於作者琅石生的資料，卻不得而知。曾收錄琅石生小說〈頰〉的《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僅記載其「生平不詳」⁷。另外，也只在《台灣文藝》或《台灣新文學》中發現了琅石生下列的幾篇作品。

刊行誌	發行年月	筆名	題名	備註
台灣文藝	1935年02月	浪石生	内地の旅の句（内地旅句）（雪景）	俳句
台灣文藝	1935年02月	浪石生	わが暮し（我的生活）	詩
台灣文藝	1935年02月	琅石生	闇	小說
台灣文藝	1935年03月	浪石	ある日の言葉（某一天的話）	箴言
台灣文藝	1935年03月	浪石生	峠（山頂）	詩
台灣文藝	1935年04月	浪石	丘の上へ（上丘陵）	詩
台灣文藝	1935年04月	浪石	朝霞	短歌
台灣新文學	1935年12月	浪石生	頰	小說

⁶ 關於台灣博覽會，請參照呂紹理，《展示臺灣》（台北：麥田出版社，2005年）。

⁷ 鍾肇政、葉石濤主編，《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第7卷 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79年），頁325。

〈闇〉這篇小說以十二月大稻埕的裡巷為舞台。小說主角是二十二歲的「洪阿泉」，他從「南部鄉下的公學校」畢業後，原在家鄉的工廠工作，因被認為是罷工事件的主謀而遭到解雇。小時失去雙親的洪阿泉，與唯一的妹妹「阿秀」相依為命，過著貧窮的日子，但罹患重病的妹妹因為沒錢得不到像樣的治療，十九歲就去世。失去世上相依為命的妹妹，阿泉變賣家產，「立下大志向」前往台北求發展，但都會的生活卻和他當初的期待大異其趣。

他夢中的都會魅惑之美幻影，因悲慘的失業群眾、絕望的勞工，以及落敗失志的裡巷人民，未久就消失殆盡。他想親炙了解的那些新世界，卻只是充斥著一群群的失業者、痛苦的生活，在潮溼陰暗的屋中，雜居著好幾個家庭，以及充滿邪惡，並肆無忌憚在為非作歹的世界。

與「裡巷」近在咫尺的太平町，被如下描述：

從失志、失業的貧困者的處所踏出一步，走向大馬路，立刻就看得到霓虹燈、電燈匯聚的洪水，像是在比賽誰用的電量最多。紅色的霓虹燈兀自像燃燒的火焰般，艷光耀目。……紳士淑女們以異常發亮的目光盯著百貨公司櫥窗裡的厚外套和貂皮，在那種眼神旁邊，立著一個衣衫襤褸的流浪漢，帶著一張要乞討的臉，肩膀瑟縮、交叉著雙手不停發抖。都市真是一個矛盾並存的標本，也是罪惡之花永遠綻放之地。

貧窮的裡巷與繁華的太平町是如此緊鄰，卻又被製造成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那是非常近似於在熱衷購物的紳士淑女身旁，站立著一個因寒冷而顫抖不已的乞丐般的情景。

這篇小說從正在尋覓投宿地的阿泉被一個賣春婦叫住開場，而且以非常明快的速度進行。那個說只要區區「五十錢」買賣就可成交的女人就是兒時的朋友「阿足」。她被當作家裡的犧牲品——「娼媒嫖」賣掉，而淪為妓女。「娼媒嫖」是入別人戶口做養女，但實際上的處境和奴隸沒兩樣。有的「娼媒嫖」會成為主人的小妾，有的可能被「轉賣」。阿足與她死去的妹妹一樣都是十九歲，

但現在的她則變成「雙頰乾癟凹陷、雙目深陷、皮膚粗糙無光澤，且蒼白無血色如行屍走肉的幽靈」。

她被賣是為了支付地主的租金。在五年前發生「農村悲曲」——風不調雨不順的荒年欠收下，佃農瀕臨餓死邊緣，不是賣牛就是賣掉女兒才能支付佃租，就這樣阿足成了家庭的犧牲品。

論述殖民地時代台灣農業「畸形性的再組成」之涂照彥說：「一九二〇年代以自耕農為中心，而在三〇年代以佃農為中心的脫農＝持續沒落的傾向愈加明顯」⁸。造成阿足悲慘命運的原因是五年前「農村悲曲」發生時的事。當時因農產價格被壓得比一般物價便宜，農家貧窮到無立錐之地，生活愈來愈不安定⁹。

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台灣新民報》一篇以「破產的台灣農村」¹⁰為題的報導說：「說農民大眾如今已陷入瀕死狀態並非言過其實。……台灣的農村經濟因遭受恐慌的衝擊，二百五十萬個農民大眾的生活受到威脅。」

佃農的沒落以致產生為數眾多的「阿足」吧。在閃耀著「酒吧、咖啡廳和餐廳等霓虹燈」的太平町裡巷，像阿足一樣從「南部鄉下」來的女性散居在生活最底層，隱匿在島都「繁榮」的陰影下，貧窮農村的風景正在持續擴大。

被轉賣了四次，患了結核病的阿足留下「我們為何非如此受苦呢？妾身知道——誰在食我們的肉，吸取我們的血以及殺害我們，可是，可是，我們並非都那麼柔弱。大家都很愚蠢啊……。」在阿泉的凝視下，除夕夜阿足結束了她短暫的人生。

滿是對不公平社會詛咒的〈閻〉，以與其標題相對照的、小說中主角夢境中的「我們的太陽何時會升起」之場景作結束，不容否認，這是個非常概念化的結尾，然而這篇小說不只觸及台北／大稻埕內部有貧富差距問題，甚至還描寫了不得不離鄉背井、流浪到台北的「鄉村」貧窮大眾，這幾點頗值得留意。

⁸ 涂照彥，《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5年），頁256。

⁹ 同上註，頁263。

¹⁰ 〈破產的台灣農村到底會怎麼樣呢？惟有鬥爭而已〉（《台灣新民報》1931年12月12日），頁12。

實際上，在大稻埕及萬華等台灣人居住的地區，存在著許多和阿足境遇相似的賣春婦女。在田中一二¹¹所編纂的《台北市史》對這些女性有如下的描述：

在台北魔窟以及陰暗中工作的煙花女性數量非常多……。完全缺乏衛生觀念的她們，不論對花柳病或是其他性病惡疾都沒有任何的防禦手段……。在這些陰暗角落工作的煙花女不用說都是貧民女性，而且她們也是被賣至小吃店陪酒的下層階級的妻女，真是堪憐的受虐女性。……但這些私娼只在台灣人街活動，如艋舺是從鄰近的遊廓到龍山寺町、老松町旁邊的陰暗街道；大稻埕則以太平町江山樓為中心的附近一帶。這些都是娼妓被許可的範圍，每晚都極為喧鬧，她們也相當活躍，真的極為可怕，這兩地是聚集台灣人、人潮眾多之台北魔窟，也是夜夜笙歌的熱烈人肉市場，用全力榨取輕浮男人錢包裡的鈔票。¹²

若用這本書的寫法，那阿足也屬「不用說是個貧民女性」，在以「太平町江山樓一帶」的「魔窟」「陰暗角落討生活的煙花女」。

不過，在一九三〇年代中期研究台北市「娼婦」的台北婦人病院之神清一氏即指出：「據昭和十年度該院之調查，被檢舉私娼的婦女中有略低於 82%者是文盲。而具養女身分者，占了大約 83%以上，20 歲以下者不及半數。據之，吾人不得不認為，這些女性當中自願從事私娼的是非常少。¹³」

想起被稱為「娼媒嫖」的養女阿足後來變成賣春婦，而且只活到十九歲就身亡的例子了嗎？她的境遇不只不算是特殊，而且還是台北「私娼」的典型案例。雖然說「真是堪憐的受虐女性」，但《台北市史》看待「完全缺乏衛生觀念

¹¹ 田中一二任職過台灣日日新報社與台南新報社後，於 1924 年創設台灣通信社，1937 年就任福岡日日台北支局長。除了媒體界，他也創立了台灣氧化鋁工業研究所，還擔任第一計程車董事、台北州會議員等，是一位「公共事業關係良好」的人物（請參照《臺灣人士鑑》，興南新聞社，1943 年，頁 221）。

¹² 〈台北的享樂地和柳暗花明的巷弄〉，田中一二編纂，《台北市史》（台灣通信社，1931 年），頁 605-625。

¹³ 神清一，〈關於台北市的賣淫婦與花柳病〉，《台灣的性病問題》（台灣警察協會，1936 年），頁 55。

的她們」眼光之冷漠，卻是令人驚訝的，而且這種冷漠不只對賣春婦，甚至也包括全體的台灣下層階級。以下先引用該書中描寫「貧民生活」的一些段落來看。

在文明都市繁華的背後，投射著為生活所苦吃力生存的貧民群眾的黑暗陰影。與時俱進、發達發展同時，伴隨文化之提升，自然地、在正當的規則裡，進行合理的激烈生存競爭，所得出優勝劣敗的結果……。

雖說生活水準提升了，但與內地人相較之下，他們還是很落後的。總之，台灣人很容易淪為貧民，這的確令人驚訝。他們的狀況極為淒慘，不論誰都會驚嚇轉頭、不忍逼視，慘不忍睹啊！不論男人或女人都骨瘦如柴、衣衫襤褸，簡直就和乞丐沒兩樣。……

然而，這些住在貧民窟的民眾以及在底層討生活的人們多為無知、沒受過教育的人，只要有得吃、有得睡就能滿足。這種日子若一天一天過的話，本人似乎也不覺得有像別人認為的那般為貧苦所苦、所擾。如同所謂「乞丐只要做三天就忘不了那滋味」般的說法，結果呢，這種生活對他們而言是快樂的。……

台灣人貧民散居在艋舺大稻埕的台灣人街周圍，貧民雖四處聚居，卻可立即認出是貧民窟，其髒亂惡臭、人襤褸枯瘦、住屋破敗傾頹等，不論是誰都會躊躇不敢踏入一步的。與內地貧窮的部落民相較，其骯髒與悲慘狀況遠遠超過好幾倍。¹⁴

如同小說〈閩〉所描寫的「在潮溼陰暗的屋中，雜居著好幾個家庭」，大稻埕的裡巷確實存在足以「令人驚駭」的「悲慘狀態」。一九三〇年造訪台灣的林芙美子所寫的遊記，可作為佐證：

大稻埕！大稻埕！是大汙流，是出賣歷史的市場。……像這樣的大稻埕在內地是看不到的。極其髒汙與極其美妙之處都非常難以形容。駭人歷史的汙穢之地，彷彿是進入賊仔市般，一片混濁。如汗水窟。……。集塵埃、汙垢與惡臭於一身的貧民窟。¹⁵

¹⁴ 〈台北的社會事業與貧民的生活〉，《台北市史》，頁 585-604。

¹⁵ 林芙美子，〈台灣風景——福爾摩沙橫斷記〉，《改造》（東京：改造社，1930年3月），頁 146。

然而，正因為是日本統治才造出「下層生活的悲慘狀況」，這種想像力從《台北市史》並無法得見。更不用說「只要有得吃、有得睡就能滿足。這種日子若一天一天過的話，本人似乎也不覺得有像別人認為的那般為貧苦所苦、所擾」。說像阿泉或阿足這一種「台灣人的貧民」，甚至連苦悶的感知能力都闕如，足見其認知、解讀之暴力。

這種對貧困台灣人的汙衊認知，也毫不避諱地出現在居住在台灣的日本人「工業主」的座談會上¹⁶。

中島：廢物利用啊，本島人適合做。最近多了不少深夜的拾荒者。

高石：在火葬場對面有家廢紙場。

中島：經常幫我們回收廢紙。(笑聲)

鈴木：在青年團當夜警巡邏時，發現街上拾荒者數量多到讓人嚇一跳。

……

中島：他們一天若有二十錢就夠活，生活水準差不多低到這個程度。

鈴木：他們幾乎都不恥於撿拾吃剩的火車便當，撿拾座墊下的食物殘渣吃時，也很自在。

……

宮川：因為貧窮才聚集過來的。

鈴木：聽說在三張犁有爭搶剩菜剩飯吃的。

宮川：總而言之，這些話題已讓我們跌掉落到不景氣的谷底了。

靠著拾荒艱苦維生、必須吃殘羹剩飯過活的人們，在這個座談會中成為與會者笑談的話題。簡單一句「因為貧窮才聚集過來的」話作了結論，然而「台灣人貧民」為何會如此窘迫度日呢？這問題他們卻是連想都不願意想。因他們完全不問殖民地統治下的政治彈壓與經濟榨取等事，所以能不勉強地說「在正當的規則裡，進行合理的激烈生存競爭，所得出優勝劣敗的結果。」(《台北市史》)等也都毫不避諱地這麼說。

¹⁶ 〈工業主座談會〉，《台灣實業界》(1933年10月)，頁50。

對《台北市史》的執筆或出席此座談會的日本人工業主而言，「台灣人貧民」只是如此的某種存在。無庸置疑，稱他們為「無知、沒受過教育的人」是與「文明的」「吾人＝日本人」相對照的既成想像。為了「吾人」優秀的殖民者，「他者」台灣人的灰暗、野蠻、愚昧是很被需要的。

然而不只他們是特別的殖民者。愛德華·薩伊德說：「無論什麼樣的身分，都無法單獨地存在。若沒有和敵對側、否定者或反對者以群體的方式共存的話，便無法存在。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希臘人曾為了確立自己的身分認同，也常常需要野蠻人；歐洲人更是為了確立身分認同，亟需非洲人或是東方人的存在，想起這樣子的例子就沒錯了」。如上所述，世界上「文明的」殖民者們，將「野蠻人的」他者視作是必要的存在¹⁷。

琅石生的〈閩〉，儘管是太簡單化的，但卻是從正面描寫被迫生活在「下層生活」的台灣人「內心」的小說。那是與殖民者宣稱的「台灣人貧民」完全不同形象的。而且，不僅是這篇小說〈閩〉，描寫苦於貧困生活的台灣人，其實是三〇年代台灣新文學的一大主題¹⁸。特別是在《台灣新民報》中，刊載許多以描寫台灣人的失業或貧窮為題材的作品¹⁹。我先介紹其中的一篇，是在一九三一年發表的林克夫〈失業的時代〉這首詩。

一群群的勞動者，洪水般地、從工場裏洶湧出去！是不是回家休息？是、是讓他們永遠地……因廠主已把他們開除！

一群群的失業者，襤褸地、憔悴地、日於街上徘徊，他得不到一點慰藉，他贏不到些微同情，……這失業的時代啣！凶狠！猙獰！時時刻刻地，總想虐弄勞動者的運命。²⁰

¹⁷ Edward Wadie Said, 《文化和帝國主義(上)》(東京：みすず書房，1998年)，頁113。

¹⁸ 請參照許俊雅，《日據時期臺灣小說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頁448-456、黃慧鳳，〈日治時期臺灣文學中的勞工形象〉，《臺灣文獻》(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4年3月)，頁240-272。

¹⁹ 例如守愚，〈一羣失業的人〉(1931年4月18日、25日、5月2日)、孤峯，〈流氓〉(1931年6月13日、20日、27日)、克夫，〈阿枝的故事〉(1931年10月3日、10日、17日)、點人，〈島都〉(1932年1月30日、2月6日、13日、20日)等等。

²⁰ 克夫，〈失業的時代〉，《台灣新民報》(1931年7月11日)，頁11。

一九三四年五月六日，台灣文藝大會決議通過組成台灣文藝聯盟，在其大會宣言中的一開頭便提及到：「（一）自從一九三〇年代以來席捲了整個世界的經濟恐慌，是一日比一日地深刻下去；到了現在，已經是造起舉世的『非常時代』來了。看！失工的洪水，是比較從前來得厲害。大眾的生活是墮在困窮的深淵底下；就是世界資本主義園的一角的咱們臺灣，也已經是受著莫大的波及了」。日趨嚴重的失業問題，不但已經影響到社會大眾的生活，更讓文藝者理解到這個問題將成為自身文學路上的課題²¹。

三、〈廢物的人生〉——黃氏寶桃〈人生〉（《台灣新文學》，1935年12月）

黃氏寶桃所著短篇小說〈人生〉，是描寫被稱之為「K庄」的鄉下地方之「廢物的人生」。黃氏寶桃與琅石生在生平經歷上，同樣也有許多地方不得而知²²。

「因為長期的不景氣，使得 K 庄也開始了村民救濟事業」，為了能領到微薄的日薪，「不分男女老少，大家都爭相報名」，就連「似乎快要無法行動的老年人」也在烈日當空下，從事著建設「寬廣的車道」的工程。

某天，山的斷層崩塌，有位懷有身孕的年輕女工，就在丈夫的眼前被悽慘地壓死。而作者就是將著眼點放在懷抱著不安且身體顫抖地想著，說不定自己也會慘遭相同的命運，卻仍不得不繼續做著危險工作的人們這一方，以及無法得到此工作的人們這一方等二者身上。

行動不便的男人在最嚴苛的工作中，不經意地說了一句話：「這就是所謂廢物的人生吧！也只能死心了，誰叫我們一出生就是廢物呢……。可是如此辛苦地工作，日薪竟然只有區區的六十錢，這實在太過分了！……」令人印象特別深刻。然而據《台北市史》的觀察記載：「在底層討生活的人……本人似乎也不覺得有像別人認為的那般為貧苦所苦、所擾。」從這裡即可得知這個觀察是多麼膚淺且殘酷了！

²¹ 賴明弘，〈臺灣文藝聯盟創立的段片回憶〉，引用自《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文獻資料選集》（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頁383。

²² 星名宏修，〈殖民地的「混血兒」——「內台結婚」的政治學〉，藤井省三、黃英哲、垂水千惠編，《台灣的「大東亞戰爭」》（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2年），頁291。

但是像小說中所描寫的那種不穩定且嚴苛的工作，卻絕不是特例。據說「如果依照昭和五年警務局的調查，本島的勞動者總數是五十七萬七千七百多人，其中的 73.3%，相當於四十二萬餘人是屬於流動頻繁的一日零工。²³」大概全部工人的四分之三都是「流動頻繁的一日零工」，雖然並無記載「一日零工」的平均工資是多少，但是在相同的調查中，卻記錄了台灣男性的平均每日工資是 1.06 日圓、女性則為 0.53 日圓，從這裡即可體會出「日薪竟然只有區區的 60 錢，這實在是太過分了！」這句沉重的對白了吧。附帶說明日本男性大約可領取到台灣人的一倍工資，約 2.10 日圓，但是日本女性則僅能領到 0.78 日圓而已²⁴。

村民的「救濟」事業就是在這種「苛刻」的條件下實施，當「寬廣的車道」完成後，則以之為殖民地統治的成功案例加以傳頌，然而殖民者卻絕口不會提起，例如像是慘遭壓死的女性，或在嚴苛的工作中死於非命的人們。這是在研究「殖民地現代性」時絕不能遺漏的，同時也充分於短篇小說〈人生〉當中被證實。

而在《警察沿革誌》中就指出了重點：「本島工人即占總工人數的 93% 以上」，而「出外打工賺錢的人，仍舊跳脫不了以農民出身的居多此一狀況，所謂的無產階級是相當貧困的。²⁵」小說〈闇〉的主角雖非「農民出身」，卻也是個從南部農村到台北「出外打工賺錢的人」。另外，在前述的沿革誌中所記載的「第四點」特徵：「在本島工人運動上，需注意工人之間的民族對立」，這也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地方。

內地人在大規模企業之中獨佔資本，再者內地人在工作上也擁有主要的技術，大部分的本島工人，在技術都還未成熟之際就在其底下工作，此狀況使得兩者之間的工資比例與勞動內容，差異極大，從而促使本島的勞工市場愈趨複雜化。

²³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 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1939年），頁 1198。引用自南天書局 1995 年的復刻版，原本本來是「工人總數是 17 萬 7 千 7 百餘人」，後來應該是誤植成了「57 萬 7 千 7 百餘人」。

²⁴ 同上註，頁 1205。

²⁵ 同上註 23，頁 1216-1217。

這些諸多特徵是本島的勞工文化與低生活水平所結合而成，而這重要的特徵也表現在本島的工人運動上，無論是自然而然地發生在工人間的爭議，或者是基於階級意識的抬頭，卻都欠缺了必須引導走向主動團結的條件，同時與其民族特性互相結合的是，會因煽動者的趁機煽動而容易被利用，而這趨勢在本島的工人運動發展與衰退過程中一覽無遺。²⁶

殖民地警察在承認日本人與台灣人之間「工資比例與勞動內容，差異極大」的同時，卻將其根本問題置之不理，並且還認為台灣人「會因煽動者的趁機煽動而容易被利用」之「民族特性」是危險的。

那麼話題回到小說〈人生〉，如同前面所述的一樣，對於就算依賴「村民救濟事業」也無法獲得「救濟」的人們而言，也只剩下了以台北為目標、做一個「農民出身出外打工賺錢的人」這條路可走吧！也因當時台灣產業政策從農業轉變為工業，三〇年代佃農的沒落傾向變得顯著，更加速了農村的衰敗。

許多人離開了農村，湧進島都。由於當時正受到世界不景氣的影響，台北街頭因此增加了許多失業者 and 流浪者，造成治安惡化的社會問題²⁷。《台灣新民報》則寫上如此煽動的標題：「連台灣也出現毫無止盡的失業人口嗎？」如同報導中所言：「眼看失業人口的增加幾乎是呈現毫無止盡的狀態，……台灣人的失業痛苦指數與內地人比較起來，實在嚴重上好幾倍，無論是知識階級或是無產階級的工人，都一起迷失在這條困難重重的求職路途中，其人數之多，已無法用數字來一一表示」²⁸，此時失業問題特別沉重地壓在台灣人的身上。

在註 19 所提及的孤峯的小說〈流氓〉，故事是描寫遭受印刷工廠解雇，無處可去的工人「阿 B」，「淪落」為公園裡「流氓」的過程。昔日是「資產階級」的「公子、小姐們」所遊樂的公園，現在卻變成了「流氓聚會所」，「流氓」在公園內喊著：打倒「萬惡的源泉」的資本家。小說以響徹四方的叫囂聲與緊張的場面，劃下句點。

²⁶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 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頁 1217。

²⁷ 葉倩瑋，〈殖民地主義與都市空間——在台北的權力與都市形成〉，竹內啟一編著，《都市·空間·權力》（東京：大明堂，2001年），頁 59。

²⁸ 「連台灣也出現毫無止盡的失業人口？這是個重大的社會問題！！當局是怎麼看的呢？」，《台灣新民報》，（1932年1月30日），頁 15。

如同小說〈閩〉的主角之「大志望」所以崩潰，是因為來到台北所等待他們的，大多是與亮眼、摩登的現代都市風貌相對照的「最下層的生活」。

儘管他們的生活過得如此悲慘，卻算是「在正當的規則裡，進行合理的激烈生存競爭，所得出優勝劣敗的結果」，《台北市史》中則認為：「總之多半是本身的處世方式過於拙劣所導致的」，到末了終究還是以自我的責任問題將其矮化。

一九三〇年代的台北，已蛻變成如同電影《跳舞時代》中所呈現的現代都市，但是在快樂地跳著舞與划著船的青年們的四周圍，卻絕大多數都是像阿足般衣衫襤褸或是像阿泉一樣的失業者，正痛苦的過著「最下層生活的悲慘情況」。然而就算是在遠離台北的農村，也存在著為數眾多的台灣人不得不無奈地過著的「廢物的人生」。

該如何說明、表示出「都市現代化的同時所衍生出的貧困問題」這個現象呢？就像截至目前為止所闡述的，殖民者與台灣人之間的差異甚大，而不可遺忘的是台灣的「殖民地現代性」，就存在於這樣的矛盾與互相抗爭的言論空間中。

在本論文所列舉出的〈閩〉和〈人生〉，已鮮明地刻劃出殖民者與《跳舞時代》所沒有描寫出來的殖民地「不平等的現實」。

四、大正民主主義與對下層階級的視線轉換

到目前為止的章節，在一邊說明〈閩〉和〈人生〉的同時，也討論到殖民者用怎樣的視線在看待台灣人的下層階級。除了上述的兩篇作品外，三〇年代的台灣新文學也如同前面已陳述過的那樣，將台灣人的失業以及貧困問題當成了一大主題。然而在殖民者方面，對於台灣人的貧困也並非完全袖手旁觀。

站在管轄殖民地第一線，且隨時監視台灣人動向的總督府警務局，在一九三五年發刊的《台灣的警察》中，刊載了關於「取締流浪者」的章節，將「流浪者的跋扈與其原因」做了以下的分析：

取締流浪者，也就是無賴漢，是台灣的警察需要關注的現象之一。……

台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教育還未普及的時代，下層階級的台灣人，是

無法辨別善惡，而且還有喜好隨聲附和的毛病，造成市井小民持續不斷地受到騷擾。……

要將這些在歷史與環境中，總是帶來災禍的流浪者改過遷善，引導成為忠良的善民這件事，只單靠警察的取締是不夠的。多數情形是必須結合社會教育和其他環境因素來共同加以改善的，台灣對於這些人的矯正政策，應該要從他們的幼年時期便開始逐步觀察，將其收容於感化院，或是讓州廳做取締不良少年的行動，不然就是用矯正惡癖的名義，制訂取締法監視這些人。²⁹

對警察而言，「流浪者，也就是無賴漢」，他們的存在很有可能會危險到威脅治安。因此將他們「引導成為忠良的善民」這件事，就變成了一項重要的課題了。

就連至目前為止已引用多次的《台北市史》也有如下的敘述：

在台北市內徘徊走動，翻找垃圾箱的台灣少男少女，每一個都是下層生活者的小孩，據稱他們有非常強烈的竊盜傾向，正因為是支那民族，所以時常會做出竊盜或其他輕微的犯罪行為。……

而沒有職業的無賴漢在街頭徘徊，常會做出種種凶惡的壞事，失業者不但無家可歸，也沒錢可以吃飯，有不少人因為難以忍受飢餓窮困，就做起盜賊之類的事。無論哪一種全都是會毒害社會，與傷害良民的棘手人物，警察雖然經常嚴格的取締，也盡力教化社會，卻還是不容易貫徹到底，並逐漸成為警察的麻煩。³⁰

絲毫不隱瞞對「下層生活者的小孩」、「無賴漢」、「失業者」的警戒心，並將這些人看作是潛在性的犯罪者。如果從他們表達出的想法來看，在林克夫所描寫的「襤褸地、憔悴地、日於街上徘徊」的「一群群的失業者」，以及孤峯的小說〈流氓〉裡的登場人物「阿 B」等人，不外乎就是「毒害社會與傷害良民的棘手人物」。

²⁹ 《台灣的警察》(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35年)，頁92-93。

³⁰ 〈台北的社會事業與貧民的生活〉，《台北市史》，頁588-590。

總督府警務局在《台灣的警察》刊物裡表示：「下層階級的台灣人，是無法辨別善惡，而且還有喜好隨聲附和的毛病」，並將其看做是危險行為的看法。而同樣在警務局的《警察沿革誌》中，是以工人運動的特徵：「會因煽動者的趁機煽動而容易被利用」，可以說是與列舉台灣人的「民族特性」一樣相同的見解。也就是說，台灣人的失業問題以及勞資糾紛的原因，不應在社會性經濟層面上的「不平等之現實」追究，而是將問題的思考邏輯放置在台灣人的「惡癖」與「民族特性」上頭³¹。由於自認為對台灣人的「民族特性」有本質主義（essentialism）的「理解」，所以不願面對發生在殖民地上的「不平等的現實」。

只是這樣的思考邏輯，要說是殖民地警察個別的想法，倒不如說是因為當時的背景因素使得對於認識罪犯或精神病患、貧困等等社會問題的方法，有極大的轉變。

芹澤一也在《從「法」解放的權力》一書中，如此地論述：從明治三〇年代中期直到大正七、八年間，都亟欲徹底改變當時在「犯罪、瘋狂、貧困的領域裡……，所給予的處置方式」。而出現這樣的新言論，讓「統治（稱做民眾的）他人」的機制產生了轉變³²。

如有涉及到犯罪的領域，為了防範「尚未發生」的犯罪，變成全心致力於「事前」發現危險罪犯（以及還未犯罪的未來罪犯）的「徵兆」，而動員社會學、人類學、醫學、精神醫學、生物學等等。

精神醫學方面，則是將精神病患說成是戴著「各種假面具」，隱藏在「罪犯、不良少年、流浪者、乞丐、賣春婦」後面的人，讓人有「正在散布禍害」的危機感。吳秀三的言論就是從瘋狂這方面提倡「社會的防衛」，後來廣泛為人們所接受。

³¹ 荊子馨在〈糾結的對立——殖民地台灣的認屬關係・認同身分與政治運動〉一文中，也針對總督府是如何去應對「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做出如此的剖析：「殖民當局為了推卸自己的責任，於是建構出一種『劣等』的漢民族性，認為那是台灣人反抗行動的根源。」（《成為「日本人」》（台北：麥田出版社，2006年），頁91）。

³² 芹澤一也，《從「法」解放的權力——犯罪、瘋狂、貧困和大正民主主義》（東京：新曜社，2001年）。

針對貧困者，「方面委員制度」的創設人小河滋次郎，寫出下列一篇重要文章：

不限於貧民窟，而是包括了市郊或村鎮，無產階級者的生活狀態所呈現出的毫無秩序、不受控制。整體的樣貌就像在遠海的孤島上新開墾的殖民地一樣，更無須多說的是，這讓做為文明都市，同時也是帝國商業都市的顏面無光受到極大的傷害，除了破壞都市生活的安寧秩序之外，這裡同時也潛伏蘊藏著威脅所有事物的根源。³³

將「無產階級者的生活狀態」比喻成「在遠海的孤島上新開墾的殖民地」，小河對於貧困者／殖民地觀，抱持著「潛伏蘊藏著威脅所有事物的根源」的看法，基本上是與《台北市史》以及總督府警務局看待下層階級的視線是共通的。藉由一九一八年的米糧暴動，而以都市下層對策的名義設立了「方面委員制度」，在一九二三年也導入台灣，針對貧困者「透過教導援助而發揮整頓治安的作用」³⁴。

將罪犯、流浪者、賣春婦、精神病患者，還有殖民地人民，看成是有可能危害社會，以及具有潛在性危險的「社會之敵人」。在他們「散播毒害」之前，就先運用知識網絡做預防性的介入行動，芹澤把這稱呼為是「（大正時代般的）言論與實踐」。

總督府警務局會對於台灣人（下層階級／工人）的「癖性」及「民族特性」，抱持不信任的看法，其實也是因為受到這種「（大正時代般）的言論」之影響。《台北市史》始終用殖民者的視線，將在「陰暗中工作的煙花女性」與「在底層討生活的」「悲慘狀態」兩者拿來相提並論，並且一再強調其危險性，而這也是諸如此類言論中的一環。

³³ 芹澤一也，《從「法」解放的權力——犯罪、瘋狂、貧困和大正民主主義》，頁 178。

³⁴ 大友昌子，〈台灣窮人的生活與社會事業——對於台灣一九二〇年代～一九三〇年代從「社會事業」的一項考察〉，台史研究部會編著，《台灣的近代與日本》，（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2003 年），頁 165。

五、結語

以「殖民地是天堂」作為副標題的《聞書水俣民眾史（熊本縣水俣的民眾紀聞錄）第五卷》，內容是收錄了從故鄉水俣離鄉背井，移居到殖民地朝鮮的日本人所提供的證言。那些在水俣「幾乎是過著乞丐般生活」的人們，「一跨海來到朝鮮，只要是日本人，其生活水準隨即提高一倍或兩倍，有著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對於有如此回憶的他們而言，的確「殖民地是天堂」³⁵。

殖民地對他們而言雖然是「天堂」，可是朝鮮人又是過著怎樣的生活呢？身為殖民者，絕對很少有人會去思考造成這「不平等的現實」之原因，就如到目前為止的闡述般，在台日本人的情形也相同³⁶。

本論文以琅石生的〈閩〉與黃氏寶桃的〈人生〉為中心，把在小說中所描述出來的貧困與殖民者的視線交互參照，討論台灣人與日本人是如何地去面對「不平等的現實」。

一九三〇年代的台灣，尤其是島都台北，確實如《跳舞時代》所描繪的，具有「現代都市化」的趨勢，而達最鼎盛期則是一九三五年舉辦「施政四十周年台灣博覽會」時。但又如三〇年代的台灣新文學，將為貧困所苦的台灣人當成重要主題般，在《跳舞時代》和〈命運難違〉中所呈現的舒適生活，對大多數的台灣人而言，事實上是相當遙不可及的。

此外，身為殖民者的日本人，將下層階級的台灣人看做是「無知、沒受過教育的人」，這樣即能以「文明的」統治者自居。同時，更以本質主義來解釋台灣人的「民族的特性」，藉以巧妙地逃避要面對的台灣人作家寫在作品中的、屬於殖民地社會層面、經濟層面上的「不平等的現實」。

在研究「殖民地現代性」時，對殖民地人民的貧困該怎樣去認識，以及該如何去表現的問題，可說是決定性的重要論點。

³⁵ 星名宏修，〈「殖民地是天堂」嗎？——沖繩人的台灣體驗〉，《複數的沖繩——從離散到希望》（京都：人文書院，2003年），頁169。

³⁶ 於註35的論文當中，也談論到沖繩人在台灣殖民地的親身經驗，其內容是如此陳述著：「渡海來台灣的沖繩人也因『發現』到台灣人的貧窮程度，反而加深了內心深處裡的『日本人意識』／『帝國意識』」。同上註，頁175。

